

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汇编

(四)



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

首届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

从山东义和团看义和团的战略战术

崔 云 华

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近代史上，人民武装与中外反动派斗争中创造和使用的战略战术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气壮山河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义和团谱写的壮丽史诗中不乏军事科学艺术瑰宝。本文拟通过几个众所周知的山东义和团战例，对义和团的战略目的和战术使用谈几点不成熟的粗浅看法。如有错误请同志们教正。

一、杠子李庄之战

杠子李庄之战发生在山东省济南府辖下的平原县杠子李庄，时间为1899年10月11日（清光绪廿五年九月初七日）是因为清军镇压义和团，逮捕义和团领袖朱红灯，李长水等引起的。

在此以前，山东著名义和团首领朱红灯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已经在邻近的高唐、茌平、长清一带如火如荼地展开。平原县“连年歉收，贫民无所得食，而教民恃教士之势，借教士之财，抬高粮价，囤积居奇，平民正在嗷嗷待哺之际”（《御使高煦奏折》、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第四十九页）。以李长水、杨保文为首领，以杠子李庄为中心的平原县反洋教烈火已经点燃。以李金榜为代表的教会势力惊恐万状，便借与李长水、杨保文“彼此齟齬”（《济南府稟》、《山东义和团案卷》上册第20页，以下简称《案卷》）的机会，勾结平原知县蒋楷，快捕陈德和到杠子李庄抓人。陈德和等先向李长水勒索钱财，后欲实施逮捕，李长水奋起抗拒，潜逃。陈德和便抓获团众邱波子等六人回衙交差。李长水闻讯赴琉璃寺向著名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求救。朱红灯率高唐、茌平、长清义和团骨干数百人往援，并传邀平原义和团到杠子李庄集结。数日内招来平原、恩城义和团和曹州大刀会千余人，“义和神拳旬日间蔓延杠子李庄（《平原续县志》卷九）。

1899年10月11日平原知县蒋楷得到李金榜的报告，“有境外来匪朱红灯等数百人附和季长永等复行抢劫，残杀教民”，“声言须将前获之邱被子等六人一律放回，并原之快捕役陈德和讹伊钱文，须将陈德和交出，否则将杀尽教民”。平原知县蒋楷“即亲带勇役驰往拦捕”（《济南府禀》《案卷》上册第13页）清军至，见朱红灯率众在杠子李庄东北角竖起“天下义和团兴清灭洋”（《汇报》第146号）旗，擂鼓“持械迎拒”。“勇役等上前捕拿”，义和团排四人一圈队形、采取“轮伏轮起，轮进轮退”（《蒋楷：《平原拳匪记》）战术“恃众呈段，致伤差役二人”。义和团“人数渐聚渐众，声势颇大”。（《平原县禀》《案卷》第12页）蒋楷在新内呆若木鸡，问左右“骑马快？坐轿快？”被快捕陈德和从轿中拉出，托到马上，统带勇役，落荒而逃。

是役清军伤二人（无义和团伤亡记载）。

二、森罗殿之战

森罗殿之战发生在杠子李庄西北，平原县城西南离城18里之大芝坊庄。时间为1899年10月18日（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）山东巡抚毓贤派济南知府卢冒谄、管带亲军管补用知府袁世敦统“带马步队七百余”（《汇报》第146号）分兵三路包剿朱红灯义和团，中路直扑大芝坊庄。时朱红灯率杠子李庄得胜之兵近二千人向恩县刘五庄庞庄教堂进军，途中在森罗殿暂歇。接报后决定在此“设伏”迎战。

1899年10月18日晨清军骤至，义和团伏兵杀出，列阵迎拒，点燃抬枪，“轰毙队员二名”。随即朱红灯持刀骑马率众冲

向敌阵。清军抵敌不住，溃败“二里奔”（《袁世凯致徐世昌函》
《近代史资料》1978年第二期）袁世凯羞愧异常，无地自容：
“今日不活矣，捕一土匪而受挫至此，复何目见人”（蒋楷：《平原拳匪纪事》）后觉义和团停止追击，阵角稍定，随即指挥清军用洋
枪对义和团排枪齐射。义和团20人在排枪中丧生，首领孙亦泰即时
阵亡。朱红灯“知势不敌”指挥义和团“分路逃逸”。“仗后多时，
团民逃窜已净，众兵仍在庄外肆放枪炮”（《平原县》《案卷》第
17页）以致惨无人道对平民开火，以泄私愤。

三、药王庙之战

药王庙之战发生在德州城东，时间为1900年7月26日（清
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）时为清廷颁布《向各国宣战谕旨》，命令各
督抚招民为团的第六天。山东巡抚仍“护洋人而剿灭团匪”。

1900年7月27日小史庄有刘旺为首聚众二里余人，焚杀教
民五处，男女二人”（《德州禀》《案卷》下册第801页）是夜团
民刘平、赵瑞田、张德明在德州南门外为清军拿获。

7月26日德州义和团首领薛登魁、刘旺、马昭林等率数百人列
队“抵城外药王庙，声称来索刘平等三人”（《案卷》下册第802页）
清军总兵孙金彪谎称“应赴州署求释”，骗薛登魁、刘旺等进城后立
即指挥清军开到药王庙对义和团进行镇压。时义和团一字排列在药王
庙前沟崖上。清军帮统张奉先命令清军向义和团群众用排枪扫射。首
领马昭林指挥义和团战斗应声卧伏沟崖。清军以为均被击毙，蜂拥而
至。义和团乘其不备，点燃抬枪轰击并冲入敌群搏斗。时已夜幕降临，
清军“军容遂挫”，“军心慌乱”，四散逃窜，总兵孙金彪被迫逃入
三官庙藏身，待天明后方敢入城。义和团奋勇追杀，重创清军。后驻

守桥口军械局清军赶来助战。薛登魁等已救出刘平等，便指挥义和团收军撤退。是役清军惨重。一说死二百余名。（陆景琪：《义和团在山东》第73页）张率先“落马受伤，被砍身死，扭帮带及先锋官一名，副哨官两员，亦先后阵亡”（《案卷》下册第803页）义和团三十人牺牲。

四、玉皇阁之战

玉皇阁之战发生在蒲台县城东南双台。时间为1900年8月17日，时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第四天。八月间，袁世凯授命张勋，对滨州、阳信、沾化、利津、蒲台等县义和团进行了大规模屠杀。义和团众在清军洋枪大刀下丧生达“万余人”（《案卷》上册第5页）。

8月13日，滨州马店义和团首领金玉胜率义和团群众转移至蒲台罗台地方，与蒲台义和团联合共计数百人，据玉皇阁同清军抗。大刽子手张勋称此“半系海丰、流钟口、阳信三处漏网悍匪”、“死党”、“枪炮军火甚多”。恃“其强悍，并有枪炮，得地利，故敢公然盘据，抗拒官兵。”“著名首恶如金玉胜、李军师、祁大师兄”、“仿之贼张献忠亦不是过”。玉皇阁台基高八丈，由深数尺、宽四五丈之濠沟环围。只有一条仅容二人并肩挤上的五尺窄道可由台前拾级而上。义和团在玉皇阁上安装了四尊大炮、八尊山炮、十六杆抬枪。在阁后濠内安了梅花桩，以备退却。

8月17日凌晨四点钟，张勋指挥十六棚清军分四路对玉皇阁进行偷袭。狡猾的敌人“銜枚疾驰”，从四而八方向玉皇阁接近；“直至相距数武，”才被发觉。金玉胜立即指挥义和团用大炮轰击，

但因清军已逾过炮火封锁线，炮火无济于事。义和团利用占据的有利地形利用一切手段阻击企图越过濠沟、向台基接近的敌人。敌人虽然不断“开枪痛击”，义和团被杀伤“甚众”，仍在无畏地战斗。清军“接战两小时许”才越过濠沟“齐集台下”。

义和团被迫退到玉皇阁台基之上，继续利用“地势险峻”的有利条件，阻击清军。清军“仰攻至易”一接近台基，义和团“即以砖石下击”。清军不断被砖石击伤，最高指挥张勋也不能幸免，左肩右腰“均受砖伤。”最后张勋用廿两银子一位的偿格，组织起十人敢死队，用洋枪突击一面，杀死此处守台义和团战士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才乘机登上台基。

在金玉胜领导下，义和团战士皆退集玉皇阁上”，或据守墙垛，或分守门窗，与敌人作最后周旋。清军一接近阁墙，义和团“即以火药包掷击”，“居高击下，终占上风”。最后张勋“得一车上装料菠萝自覆于顶。”义和团下击的砖石，火药包“均为所格”。“重出偿格”收买的突击队苦战一小时，玉皇阁方“始被攻入”，“然受伤弁兵已较以前各战多至数倍”。接仗三时许，清军共用“冷气开斯枪子12834粒，省士得枪子1340粒”。（《先锋队后路左营张勋禀》《案卷》第58—61页）

清军攻陷玉皇阁后，对阁内义和团进行了残酷屠杀。金玉胜以下五百余人壮烈牺牲，二百余人被俘。

五、玉皇庙之战

玉皇庙之战发生在济阳城南乡距城五十余里之玉皇庙，时间为1900年9月24日（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）袁世凯派重兵镇压滨蒲地区义和团刚刚得手，著名义和团首领孙玉龙等却在共“卧榻

之侧”把山东义和团的军事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峰。

孙玉龙又名孙允荣，祖籍惠民，最早在故乡竖起“山东武定府惠民县城西孙家大师兄”旗帜，然后在城关、田家集、石人王、王判镇设厂练拳，被推为总大师兄。1900年八月间与济阳、齐东、章丘、邹平、惠民六县义和团首领陈云岭、孙九龙、王敬典、郭书卿、丁盛祖、王五云、王殿魁、霍士桐等率七百余众在济阳玉皇庙聚会，被推为“六县总大师兄”、大元帅（《济南历城会案》《案卷》上册第159页）在济阳一带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。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报“有外来拳匪勾结本地匪徒，在彼集数百人，抢劫附近教民财物，烧毁房屋”、“将教民李宝善之母李赵氏架至玉皇阁内杀死，烧尸灭迹《济阳县会案》《案卷》上册第231页）。立即派候补知县查荣绶率马步队150人前往镇压。

孙玉龙为首之义和团“沿途亦有探子，预防官兵击拿”（《济阳会案》《案卷》第223页）9月23日，清军开抵济阳，坐探张准瑞等飞马来报，孙玉龙立即传帖邀请各地义和团前来增援，一日间“聚众千余人”，兵分三路：孙玉龙、王生财领中路，居中；孙九龙、正德领右路在北；李玉云、霍凤同领左路在南，严阵以待。

9月24日黎明，清军“马步队哨官周树森、王玉山等率众进剿，开放排枪，奋力齐击。查委员在后督阵，击毙土匪数十名（《案卷》第227页）。不料义和团三面包抄，冲扑而来。“孙玉龙乘马当先，将查令打倒马下，被魏辈仔”，“王生才等砍伤，立时身死”（《案卷》第160页）清军左冲右突，“抵敌不住，只可且击且退。”济阳知县见状大惊，立即向袁世凯报警：“官兵与拳匪开仗不利，现在匪势甚大，反追官兵，事在危急。赶紧多派拨马队

并大炮到县”（《济阳县志》《案卷》第224页。

是役义和团牺牲四、五十人，击毙清军查荣绥目兵以下三、四十名。

次日清军马步炮三营赶到，孙玉龙已率部转移到商河县境。

六、关于义和团的战略目的问题

毛泽东同志指出：“战略问题是研究全局的规律”，战术问题是“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。

义和团总的战略目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“灭洋教”。山东巡抚袁世凯就郑重的指出义和团是“专仇洋教”，“图灭洋教”

（《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摺》《义和团史料》第92页）。义和团所到之处，均“声言抄杀洋教”；“城锁集市、遍布传单、灭洋灭教，众口一词”。（李林《拳匪记》）朱红灯在杠子李庄之战斗中竖起“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”，就是“兴大清、灭洋教”（《万国公报》卷/23）。

义和团武装矛头所至，也为其总战略目的写下了一则可靠的注脚。任何一支义和团武装，都与“灭洋教”相为始终。全国义和团在“灭洋教”中形成了战略斗争的真正统一。山东义和团的战斗实践证明其打击的对象是洋教堂，教士和教民以及一切阻碍反对“灭洋教”的军事力量、政治集团甚至个人。据全国统计，义和团计杀杀教士/86人，天主教士35人，教民2万人（《黄大授《中国近代史》下册第//2页）。义和团也打击部分清军，从山东省看，本文例举的五个战例都是义和团团为闹教，打击在鲁教会势力为序幕。义和团与清军不断发生战斗，究其因，都是因为清军为保护教堂、教士、教民而对义和团实施镇压。战斗也是被清军强加于身，

非自己所愿。山东义和团最恨袁世凯，“皆有欲杀之势”，袁世凯对此也“防范甚严，有于卧室处密护铁网说”（佑原笃介：《拳事杂记》）是因为他推行“扶教抑民”，“重刑督促官绅、吏役保甲长查拿拳民”；“无论军民人等，凡有练拳或赞成拳丁者杀无赦”政策。

义和团武装力量的松散组织形式也是与其总战略目的——“图灭洋教”相适应的。义和团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与一致公认的领袖人物。其组织之松散，常为军事史家不屑一顾。从山东义和团可以看出，它一般有两套组织机构和指挥系统；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完全一致。平时义和团组织机构为坛口（或拳厂、拳场）一般以自然村落为茎端，由总大师兄、大师兄、二师兄主持、负责扩大队伍、发展成员和军事训练，习武练拳。战时“分编哨队”，“其各寨哨队者、皆丁壮少年”，由/0长、百长统带。各哨队听从临时推举的总办、统领、打探、巡警、前敌、催陈等指挥。”其充总办、统领者、皆阴势教师，充前敌、催陈者，皆凶横匪类，骑马当先，往来督战”。（《山东巡抚袁世凯摺》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第93—94页）这支半军事武装，用来组织野战军推翻清王朝显然不能胜任，用来漂洋过海远征国外那是笑话。用来阻击帝国主义的入侵联军也有困难，但对付在华教会势力，打击教主、教民却是绰绰有余，可谓足矣。

伴随着清军镇压的强化，在与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清军战斗中，义和团武装组织也略有创新，在联合作战，统一指挥等方面也出现过一些尝试，例如靳盛然、赵玉庆在沿化县流钟口设立“五县总拳厂”，“沿化、利津、阳信、滨县等各州县义和团“均听调

遣”(《沿化县会票》《案卷》第778页)；徐立疆“总管滨蒲等五州县拳厂，众约三万”(《青城县票》《案卷》第656页)。孙玉龙被推为“大元帅”，“六县总大师兄”，并在玉皇庙战斗中展示了一套独树一帜的指挥系统：孙玉龙为“六县总大师兄，玉皇庙与官军打仗又为伪大元帅。孙九龙为伪二元帅，又充大先锋官。六师兄王传申为参谋军师。二师兄陈乃义为主谋。披发和尚李方同为伪中路先锋官。王玉有总管粮餉账目，萧七、金仔文发粮餉”“陈六岭、蒋正为左、右两路副元帅。(《济阳县令票》《案卷》第231页)另据《济南历城会票》内容略有不同：孙玉龙为伪大元帅，并济、齐、惠、商、邹、章六县总大师兄。孙九龙为伪副元帅。大先锋。王传申为伪军师。陈乃义、王玉有为伪总管粮台”(《案卷》上册第159页)。这些创新一定程度加强了义和团的战斗力，对某些战斗例如玉皇庙之战起了积极的影响。但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。

七、关于义和团的战术

与一切军事集团相同，在对敌斗争中，不少义和团首领是十分注意战术的运用的。从山东义和团的战例中，人们不难注意到战术瑰宝闪闪发光。山东义和团经常使用的战术是“忽聚忽散”战术、伏击战术、“列陈拒敌”战术和其它一些战术。这些战术尽管都较原始，但在对敌斗争中，都起了积极作用，是保证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(一)“忽聚忽散”战术。义和团使用这个战术非常普遍，它似乎成了全国各地义和团的重要特征。“聚众抗官，传单一出，千人立聚，兵刃森列，偕同敌国”(《佐原马台：《拳匪记事》)。义和团在攻击教堂，打击教士教民或组织战役与清军抗敌前，总是传遍附近义和团队伍在指定地点集结，很快集中起优势兵力，出而不需打击敌人。

使敌人料所不及，头痛万分。“官军与拳匪在县属玉皇庙地方接仗，实缘匪谋诡谲，人数忽添忽减，令人无从测度。迨于进剿时多至减余；我军仅止马步队百五十人，以致接仗互有阵亡”《案卷》第227页）。敌人重兵到来，义和团早已四散无影无踪，使敌人失去了追击目标。

济阳玉皇庙之战，平原杠子李庄之战，森罗殿之战中，义和团的这一战术都显示了威力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这个战术的缺点是分散后便失去了继续抗横的力量，敌人一有锁索，便可顺藤摸瓜，逐个逮捕归案，例如朱红灯、孙玉龙等著名义和团首领都是分散后被捕牺牲的。

（二）伏击战术。森罗殿之战，高唐李集之战都是著名的伏击战，义和团都是利用有利地势条件设下埋伏兵，敌人进入伏击圈，立即全线出击，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。以高唐李集之战为例：高唐义和团首领王立言在李集村外大道两侧密林中布置伏兵，把跟踪而来的清军李联魁部打得大败，其伏击战术发挥得特别出色。

（三）“列阵迎拒”战术。义和团“遇有兵役、辄率众列阵，迎敌抗拒”（《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折》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第94页）。可见它也是义和团的常用战术。这一战术在杠子李庄之战，森罗殿之战，药王庙之战中都显示了威力。袁世凯认为这一战术是使其“兵弁亦多伤亡”的重要因素，从中得出义和团战斗力“与官吏不相下也”的结论。

（四）其他战术。义和团还使用过一些其他战术，例如“轮伏轮起，轮进轮退”战术（杠子李庄之战），“兵不厌诈”战术（药王庙之战）“三面包抄”战术（玉皇庙之战），“阵地防御”战术等。特

别是蒲台玉皇阁之战的阵地防御战，义和团首领金玉胜、李军师、祁大师兄等在地势险峻的玉皇阁组织了三道防线以御敌军。第一道防线由自然濠沟、台基下阻击手和安置在玉皇阁上的大炮发射的炮火组成。第二道防线设在8丈高的台基之上，备有大量砖石，等敌人靠近台边“即以砖石下击”。第三道防线设在玉皇阁上。玉皇阁“墙厚五尺，阁高二丈，房外四面均有墙垛，安置抬炮“远用炮射，近“以火药包掷击”。（《案卷》第59页）另外为“布置退路，还在玉皇阁后面水中埋有梅花桩”。上述防御体系除大炮和梅花桩失效外，其余都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战术组织水平之高，在当时历史环境中，实令人“叹为观止”。难怪张勋认为把金玉胜等比作“张献忠也不是过”。（《案卷》第60页）